

科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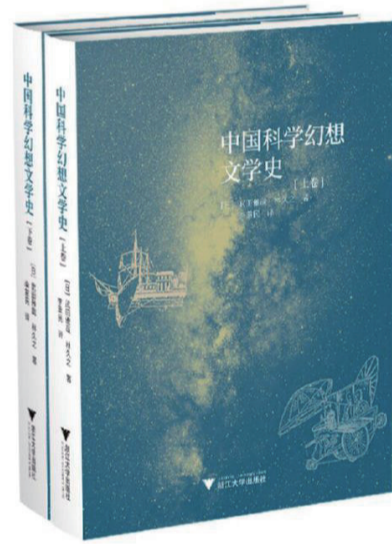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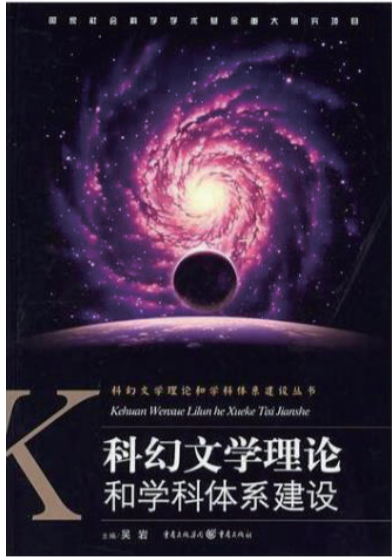
“科幻”毫无疑问成为当下的时代热词。2013年刘慈欣《三体》的全面成功在中国科幻史上树起一座丰碑，紧随而来的是各类科幻主题研讨会议的接连召开：“中国科幻文学再出发学术工作坊”（重庆，2014年5月17-18日）、“中国科幻文学创作及衍生价值开发研讨会”（北京，2015年6月18日）、“华语科幻”研讨会（香港，2017年5月30-31日）、“首届亚太科幻大会”（北京，2018年5月19-20日）、“科幻研究青年学者论坛：中国科幻研究新时代”（重庆，2020年10月17-18日）、“中国未来科幻传播发展研讨会”（线上，2021年1月30日）等等。2020年10月31日，中国科幻研究中心在北京正式成立，这意味着中国科幻研究进入一个全新时期。

■新观察

业界对科幻领域的热切关注也极大地带动了学界研究，相关成果蔚为大观，在科幻文学领域内，相关研究大体呈现为三个方面：科幻文学理论的建构，科幻作家、作品研究和科幻研究资料整理及数据库建设。

在科幻理论的建构方面，当前最具分量之作当属吴岩主编的《科幻文学理论和学科体系建设》。该作讨论了科幻小说的概念和相关理论，介绍了各语种科幻的发展及批评方法，第一次系统阐述和建构了中国科幻的理论与学科体系，为理论建构作出了突出贡献。他的另一本著作《科幻六讲》讨论了科幻的文学和功能空间，科幻研究的方法论等问题，起到一定的补充作用。刘慈欣所著的《刘慈欣谈科幻》属于作家个人的创作谈，但部分章节也谈到了如何建构科幻理论的问题，值得参考。除专著外，还有一些重要的学人观点也极具启发，如王德威提出“幽暗意识”的观点，付昌义、张洁引入人类世文学批评理论方法，萧寒对“科幻未来主义”概念的界定，都为理论建构提供了新见。国内学者也通过译介西方科幻理论著作来进一步扩展视野，如《亿万年狂欢：西方科幻小说史》《科幻文学的批评与建构》《科幻小说面面观》《科幻小说变形记》《阿西莫夫论科幻小说》《剑桥科幻文学史》等，这些译作大都涉及用西方理论批评方法如马克思主义理论、后现代主义理论、乌托邦理论、寓言理论来为中国科幻小说的研究提供新的方法指导，及时开阔了研究者的眼光。

目前，科幻研究界对科幻作家、作品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两个时间段：晚清时期和新生代时期。“中国科幻”可以追溯到晚清的“科学小说”，对晚清科学小说的研究主要表现在以下方面：首先，研究者通过分析小说的叙事特征，来对“科幻”这一文化特质作出分析和定义。如王德威在其著作《被压抑的现代性——晚清小说新论》中，用“科幻奇谭”来命名此特征。日本学者武田雅哉在其作《中国科学幻想文学史》中则用“SF”（science fiction）来进行概括，尽管各自表述不同，但学界普遍认同“科学幻想”是晚清科学小说中核心的文化质素。其次，研究者从时间和空



技术想象、诗学建构与产业生态发展

——中国科幻研究面面观

田雪菲

间入手来分析小说所体现的“时空意识”“未来中国”想象、“世界”想象等问题，并将其纳入世界文学的视野。晚清科幻小说中大量出现的“奇异时空”因在时间和空间上表现出“超现实性”而常为研究者津津乐道，这方面成果较多，总的来看集中在三个问题上，一是分析指出小说家不切实际的“狂想”实际上显示了晚清文人因知识结构的混杂和想象“未来”的曲折而陷入某种“困境”；二是指出小说家因受到西方现代时间观念和空间观念的影响而发生创作形式和思维方式的变化，这就使“未来中国”想象、“世界”想象在科幻小说中成为可能；三是从具体的小说作品和叙事范式中予以探讨，如《新石头记》中的“文明境界”、《电世界》中的“巨型铁塔”和《月球殖民地小说》中的“超级气球”这些典型的“科幻”时空多被关注和提及，以及小说中的“远游”叙事、“异域”叙事都是常见的研究范式。第三，研究者也从西方科技、现代技术的角度来进行解读，这缘于小说中常见的改造人体的洗脑、换血、换心技术和飞行器、空中战舰等先进的科学器物。从这些成果来看，研究者既注重分析晚清特殊的文化语境，也通过引入“世界”“科学”“未来”等研究面向来尝试打通“中国科幻”的文化特征。当然，晚清小说数量庞大，还有更多尚未被关注到的作品需要进入研究者的视野。

对中国新生代科幻小说的研究则主要表现为以作家为中心展开的文学创作研究和主题、视角研究。自《三体》和《北京折叠》分别斩获“雨果奖”后，学界对“新生代”科幻作家、作品研究呈直线上升趋势。其中，刘慈欣、郝景芳、王晋康、韩松、叶永烈是受到关注较高的作家，相关学术成果也多集中在他们身上，如宋明炜、金雪妮的《在崇高宇宙与微元之间：刘慈欣论》、汪晓慧的《异质与悖谬——韩松科幻小说研究》、汪晓慧的《中国科幻的思想者——王晋康科幻小说论》等等。主题、视角研究则通常依托于某一特定主题或视角来分析一部作品或多部作品。常见的有“乌托邦与反乌托邦”“科技伦理”“共同体”意识、“人工智能”“空间”等主题。还有从科幻小说的传播与接受视角出发来探讨数字全球化时代如何提升小说的译介质量和读者的接



受度，或多以刘慈欣的小说作为个案，分析如何推动中国科幻进入西方市场大潮。在诗学视角下，有研究者指出科幻文学的诗学特征在于建构“颠覆”和“异常”的感受，或以“空间诗学”作为理论支撑来研究小说中的空间想象、空间建构和空间隐喻等。还有在美学视角下来解读小说中的“奇异”美感、“崇高美”“残酷美”和“冷酷美学”等审美特质。主题、视角类的研究成果视野开阔，数量颇丰。

李广益主编的《中国科幻文学大系·晚清卷》（第一辑），在2020年6月由重庆大学出版社出版，这是科幻研究资料整理方面的重要成果。该系列丛书第一辑共5册，收录了晚清科幻文学中的多部经典作品，其中包含创作于1904年的中国科幻文学开山之作《月球殖民地小说》。据悉，“晚清卷”完成后，还有“民国卷”和“共和国卷”的计划。此外，科学普及出版社推出了“科幻创作研究丛书”，已陆续出版有《中国科幻的探索者：刘慈欣科幻小说精品赏析》《中国科幻的思想者：王晋康科幻创作研究文集》《百年中国科幻小说精品赏析》等。在数据库建设方面，中文科幻数据库（CSFDB, Chinese Science Fiction Database）创建于2020年11月，是面向科幻爱好者、研究者和全社会的检索型数据库，覆盖领域内的作者、作品、图书、杂志、组织、奖项等多元信息。以及由几位中国科幻迷志愿者创作的公益项目——“久隆计划”（中国科幻历史出版物电子档案馆），收录了华语世界的古早科幻文献扫描件，致力于电子化和整理归纳中国科幻历史出版物。

值得一提的是，CSFDB不仅收录了近30年来的主要科幻作品，还力图通过“关联查询技术”理清外国科幻作品的中译记录，建构系统的科幻知识图谱，以及“久隆计划”提出以“保存、收藏、分享、交流、研究、公益”为应用理念。随着数据库建设的日益丰富与完备，由其提供的技术支持和高效平台对中国科幻的创作、研究与可持续发展无疑有着重大意义。

科幻电影领域是近年来备受关注和热议的文化领域。2019年春节上映的科幻电影《流浪地球》以46.81亿元的高票房摘得年度票房亚军，创造了影史记录，这一年也被称为“中国科幻电影元年”。与此同时，“电影科技未来——科幻电影的想象空间论坛”“中国科幻电影创作高峰论坛”“中国未来科幻传播发展研讨会”等活动相继举办，使得跨界交流、合作更加频繁。2020年8月10日，国家电影局、中国科协印发《关于促进科幻电影发展的若干意见》（后文简称《意见》），提出“科幻十条”，更是大大提振业界信心。

跟随这一热潮，学界的研究成果也频出不断。首先，对近两年科幻佳作的研究成为热点。如饶曙光《〈流浪地球〉与“共同体美学”》、张慧瑜的《〈流浪地球〉：开启中国电影的全球叙事》、范志忠等的《〈疯狂的外星人〉：后全球化时代的拟像话语》等，这些文章以个案研究的方式对影片进行多重文化意义的解读，剖析其获得成功的原因。其次，研究者对中国科幻电影经验进行总结并试图打开更多研究面向。如峻冰在《中国当代科幻片的语义拓展、类型流变与传播策略》一文中对中国当代科幻片的题材拓展、类型演进等方面做出梳理总结，指出科幻片存在科幻性较弱，剧情科学性、创新性不足，制作经验薄弱的问题，并从发展策略上给出意见。黄鸣鸣在《中国科幻电影高质量发展的系统观》一文中提出要将“坚持系统观念”作为重要原则，分别从社会层面、产品层面和运营层面献言献策。严锋等人从新媒体语境下来讨论科幻景观与科幻文化，认为应当积极关注各种科幻文化形态背后的媒介环境和媒介技术，因为它们深刻地影响着整个社会文化的走向。还有一些研究者力图分析、揭示科幻电影中的某些文化征候，如宋雷在《国产科幻电影的文化征候》一文中对国产科幻电影中“缺乏关于想象和未知的审美诉求”作出反思，陈亦水的《数字媒体影像时代的未来书写——中美科幻电影的赛博空间与赛博格身体的文化想象》探索了中国科幻电影之于“赛博空间”和“赛博格”形象的影像塑造方式之特征，为中国科幻片创作寻找突破西方中心话语提供可能性。

还有研究者在一些具体的视角下做出分析，如科幻电影中的“荒岛”意象、“谜题”叙事、“共同体”观念等，这些成果都在不同程度上呈现出中国式科幻思维的特点。当然，中国科幻影片还存在很多不足。如孙佳山在《生态话语与当代科幻电影的结构困境》一文中指出我国科幻题材的影片及内嵌于中国社会的科幻意识都还很缺乏，本土科幻影片难以为人民提供新的文化认同，更没有进入普通民众的日常生活。李彬在文章《想象力、科学性与人文关怀——对国产科幻电影创作的思考》中指出中国科幻缺少由科学精神支撑的原创科学理论与科学体系，这与中国文化中缺少“对科学、真理和创造的支持”有关。总

之，《意见》的出台既是机遇，更是挑战，其更深层的意图还在于激发创作者的科学精神，共同营造中国的科学文化。

■四

科幻热潮也为中国动漫领域发展带来新的活力。首先，“互联网时代中日科幻文化高峰论坛”“新时代中日科幻文学及动漫的交流与译介”等会议的召开就“中日科幻文学研究”“科幻文学影视改编”及推进科幻、动漫与相关产业合作等问题达成共识，使中日科幻动漫交流迈入新的阶段。此外，由中信出版集团出版的《刘慈欣科幻漫画系列》第一辑已于2020年5月面世，包括《流浪地球》《乡村教师》《梦之海》《圆圆的肥皂泡》四部作品，这些行业动态都显示了科幻热潮将为中国动漫产业注入巨大能量。学界也紧跟这一趋势做出相关研究。如诸葛蔚东、张馨文《日本科幻动漫在中国的传播渠道与受众特征分析》一文以问卷调查的方式分析了中国受众对日本科幻动漫的接受状况、认知和评价等问题，为我国科幻动漫的创作与传播带来借鉴与启示。孟庆枢《让“文学”与漫画、动漫亲近起来》一文希望研究者能够通过对比漫画、动漫的切入而对文学和整个文化系统的发展做出深入思考。以及刘兆明的《价值链视角下的电影产业IP研究——以“漫威世界”及“星球大战”为例》从美国“漫威世界”和“星球大战”价值链路径中“取经”，指出IP（文学潜在价值）可以不断向电视、动漫、游戏、音像等关联产业延伸。滑彦立、李圣轩的文章《漫威漫画改编电影的繁荣、困境与展望》同样以漫威电影为例，分析了美国电影行业由漫画改编电影这一文化现象及可能遭遇的困境，为中国电影市场提供经验。

科幻研究还触伸到教育领域和视觉文化领域。业界通过召开全国青少年科普科幻教育大会，举办科普科幻作文大赛，组织“科普阅读与青少年科学素养培养”等多种方式使科普科幻教育越来越得到关注。研究者也倾向采用“科普+”“科幻+”的跨界视角来开展教育研讨。如吴岩的《富有想象力的科幻教育》一文探讨了科幻教育的形式，提出科幻教育的核心是“想象力和科幻思维力”。刘兵在《科普与基础教育》中指出要探究提升公众科学素养和教育课程改革创新理念之间的关联和一致性。姜南在《欧美当代科幻教育价值探究》一文中则通过分析欧美各国高校开设科幻课程的实践案例来给我国科幻教育的发展提供启示。还有学者从科幻文化的视觉表现等角度来进行研究，新见迭出，如王馨的《科幻题材绘画创作——对当代社会公共空间的意义》、黄鸣鸣的《从科幻电影创意看视觉文化的演变及底线》等。

总的来说，中国科幻研究已在文学、影视、动漫、教育及视觉文化等多个领域全面开花，与之相关的交流、研讨、合作活动频繁开展，呈现出强劲的发展势头。尽管各领域研究存在进度、方法、水平参差不齐的问题，但中国科幻之路毕竟才刚刚起步，相信接下来随着科幻各领域的蓬勃发展，中国科幻研究事业将迈向更加宽广的舞台。



“牛年说牛”之牛文化

张劲硕



张劲硕，博士、研究员。现为中国科学院动物研究所高级工程师、国家动物博物馆科普策划总监，中国科普作家协会理事，中央电视台“正大综艺动物来啦”节目常驻嘉宾。

遗种类，主要分布于我国西南、西北地区，现有4种：秦岭羚牛（亦称金毛羚牛、金毛扭角羚）、四川羚牛、不丹羚牛、高黎贡羚牛（亦称贡山羚牛、米什米羚牛），均为国家一级重点保护野生动物。羚牛体大而粗重，栖息于海拔1500-4000米的阔叶混交林、亚高山针叶林和高山灌丛草甸。喜欢结集十余只至上百只的大群，晨昏和夜间活动。白天躲藏在密林中休息，习惯沿着平时通往森林、草坡、水源或舔食岩盐和硝盐地点所踏出的路迹行进。嗅觉灵敏，群中有“哨牛”，受惊扰时发出报警叫声，由雄“头牛”带领，雌牛押后，幼弱夹在中间，迅速隐入密林。

那么，到底真正的“牛”的特征是什么呢？牛族的体型通常都较为高大、粗壮、敦实，四肢高度一般与躯体高度相当或略短，头部较长、鼻吻部前突，耳朵较大、横向外展，雌雄均具角，空、为洞角，先横向、再向上生长，脖颈短粗，尾巴较细而长。牛族成员依赖于广袤的草原和茂密的森林，取食各种草本植物，特别是禾本科植物，所

以食物丰富的情况下利于繁衍。但因为它们体型硕大，妊娠期较长，所以一般每胎只有一仔，偶尔有两仔。幼崽出生后，很快可以站立，并随母兽行走，甚至奔跑，属于早熟性。成年个体体型大，遭受食肉动物袭击的几率较小，反而很多牛族杀死过老虎、狮子。特别是非洲水牛脾气暴躁，经常有反抗狮子、甚至把狮子顶死的记录。但是幼崽、没有经验的亚成体，经常成为大型捕食者的食物。

十二生肖里的“牛”在十二生肖中的“牛”的概念和哺乳动物分类学中的“牛”是不完全一样的。十二生肖的牛的形象一般是黄牛——这个“代表”应该无可厚非，在与人民群众的紧密接触过程中，黄牛在中国人民的心目中，其地位要比水牛和牦牛高得多。在各种文化的表现形式中，黄牛的形象就是勤恳、吃苦耐劳、任劳任怨、执著的代名词，比如众所周知的“孺子牛”。现在，全世界广泛养殖的家养黄牛的祖先是欧亚和北非已经灭绝的原牛。据记载，在15

世纪初的时候，这种牛最后的野外种群残留在波兰的一个狭小地区，有记录的最后一个个体死于1627年。虽然原牛过早地离开了这个星球，但是它的后代繁衍壮大，成为世界上规模最大的有生力量之一，在家畜之中具有显赫地位。

原牛的后代也派生出很多品种或亚种，这是世界上许多国家人民经过千年、多代培育的结果，目前家牛的品种约500个（这其中也有很多其他野牛的后代），数量以10亿计。说到“牧童放牛”的情景，我们不难想象得到一位可爱的五、六岁孩童，骑在水牛背上，吹着短笛，悠然自在的穿梭于轻轻杨柳之间。家养水牛在我国南方十分常见，它的祖先是亚洲野水牛。人类驯养野水牛作为家畜已经有五六千年的历史了，有人认为我国的家水牛是从印度

引入的，也有人认为我国历史上，特别是南方热带或亚热带地区曾有亚洲野水牛分布，是我国劳动人民自己驯化的结果。后来由于种种原因，其野生种群逐渐从我国版图的大部分区域消失。但也有文献记载，我国西南部的米什米山有亚洲野水牛存在，但估计数量十分稀少。

另外，在我国家牛品种中，独树一帜的、誉为“高原之舟”的牦牛是青藏高原的特有品种，它曾被认为是野牦牛的后代，但也有人认为野牦牛和家牦牛可能起源于同一个祖先。我国藏族人民食住行都离不开牦牛，人们喝牦牛奶、吃牦牛肉、烧牦牛粪，将牦牛的毛做成衣服或帐篷，将其皮革、角可制工艺品，骨头是药材。牦牛既可用于农耕，又可在高原当作运输工具。今年2月5日，国家林业和草原局、农业农村部颁布的最新的《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物名录》中，我国3种“真正的牛”（牛族成员）：白肢野牛（野牛）、白臀野牛（爪哇野牛）和野牦牛均为国家一级重点保护动物。在这一牛年，希望世界上的牛儿能够与人类和谐相处，那些珍贵濒危的种类，甚至非常稀有的人类驯化的品种，能够继续延续、发展下去。

